

QING CHAO SHI DE JI BEN TE ZHENG
Z A I T A N J I U

清朝史的基本特征

再探究

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

钟焯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edia University Press

QING CHAO SHI DE JI BEN TE ZHENG
Z A I T A N J I U

清朝史的基本特征

再探究

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

钟焯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
反思为中心 / 钟焯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660-1576-1

I. ①清… II. ①钟…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2622 号

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

著 者 钟 焯

责任编辑 黄修义

责任校对 杜星宇 肖俊俊 胡菁瑶 于秋颖

封面设计 舒刚卫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576-1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对“新清史”学派的几点基本勾勒	(1)
---------------------------	-------

第一章 北美“新清史”研究兴起的学科背景及其学风

.....	(12)
第一节 “新清史”崛起前的学术背景：“旧清史”研究的一度辉煌 和旋即衰落	(16)
第二节 内亚史的知识—立场就与“汉化论”截然对立和冲突吗？ ——来自伯希和等学者的反证	(22)
第三节 并非上游——北美“新清史”学派在国际满学界所处的 位置	(28)

第二章 “新清史”学者构建的历史命题平议

——从族性晚生论到东北亚本位论	(45)
第一节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45)
第二节 试析《两个佟氏》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及其谬误	(50)
第三节 试析《清朝始祖神话序论》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及其谬误	(62)
第四节 柯娇燕对《满洲源流考》的误读与其构建的学术命题 之间的关联	(70)
第五节 柯娇燕臆造的汉军旗人的错误叙事与其学术命题的 关系	(101)
本章结语	(123)

第三章 君权总是选择特定的语言来发声

- 对“共时性君权”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129)
- 第一节 清朝官修辞书中“君部”所见君主称谓的排序先后问题
..... (131)
- 第二节 论“皇帝”(hūwangdi)在清朝君权中地位上升的历史
过程 (134)
- 第三节 文殊菩萨和转轮王为何会在“御制”类辞书的君主名称中
双双缺席? (144)
- 第四节 清朝君主的终极政治理想是“合璧”还是“同文”?
..... (151)
- 本章结语 (156)

第四章 如何从非汉文史料的角度回应“新清史”学派?

- (159)
- 第一节 从满文史料中所见的“中国”看清朝与中国的同一性
..... (161)
- 第二节 对清代蒙古缺乏“中国(dumdadu ulus)意识”的反证
..... (164)
- 第三节 中亚非汉文文献里指代“中国”的两大名称:秦—契丹
..... (173)
- 第四节 论察合台汗国时代以来作为“契丹”(中国)组成部分的
天山北路 (176)
- 第五节 论准噶尔汗国时期作为“契丹—秦”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
一带 (183)
- 本章结语:非汉文史料的引入在跨国界学术批评中的作用何在?
..... (193)

- 结 语 从学术与政治的交集看“新清史”学者的意识形态
倾向 (196)

序言 对“新清史”学派的 几点基本勾勒

毫无疑问，对北美“新清史”研究模式的学科定性是中国学者在讨论“新清史”的成败得失时应具备的首要观察前提。在笔者看来，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不仅超越了断代史（清史）和民族史（满族史）这两种常见的学科范式，更为重要的则是其试图全面建构从16、17世纪之交的明末清初一直跨越到21世纪下的当代中国的整套历史叙事，从而为其国知识界乃至政界认识中国当下选择的发展模式及道路提供一个从历史切进的入口，故无法单纯地采用国内史学的现有范式概括其学科特点，即“新清史”的研究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通常熟悉的某一具体史学（如清史或满族史）的研究特征。其从时限上来看，早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清史（1644—1840 或 1911）的时间轴；而从性质上来讲，其研究所涉及的诸多层面尤其是那些与现实政治相牵涉的叙述就更不是满族史这一内涵与外延皆相对清晰的族别史所能涵盖的。

我们不妨将构筑“新清史”研究的几大预设性立论前提归纳为：A. 类似于“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族性建构论或晚生性；B. 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对应作为现代中国领土组成部分的边疆地理版块不同程度地来源于清朝或清帝国的“征服大业”或“殖民扩张”；C. 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以此虚拟了一个空幻的学理制高点来对1911年以后的现代中国是否有权力在原来的清帝国边疆地区继续行使国家主权进行所谓学术上的裁决评鹭。故这三大立论前提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限，如A对应明

末清初至民国前期，B 对应的时限主要为清中期，C 对应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根据个人的观察，笔者将“新清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前后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前期。这一时期的成果以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为主，专著较少。不过最近已经被译为中文的柯娇燕（P. K. Crossley）的首部史学著作《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Orphan Warriors*，陈兆肆译，人民出版社，2016 年）即诞生于此期。可以说在这第一阶段中“新清史”学者已初步登上学术舞台，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005 年。本时期是“新清史”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该学派下的学者们推出专著的高潮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多数“新清史”专著，都是在这一阶段陆续刊出的，其观点的日渐流行表明“新清史”学者的成果至少在美国学术界确实得到了普遍认可。

第三个时期为 2005 年之后。这一时期是“新清史”学者继续扩大成果的时期。该学者群在这一时期没有继续推出创新意义上的专著，而是以发表论文为主，此外也有些学者开始撰写带有普及性与宣传性的概述性通论，如欧立德的《乾隆帝》等著作。同时，“新清史”的影响开始跨出英语学术界，在其他国家产生涟漪效应，一些论文被翻译成日文、法文、中文等其他语种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若干著述的行文重心已经由前述三大立论前提中的 A、B 两项转向了 C，即开始越来越多地与现实政治相勾连，热衷于讨论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边疆地区的主权诉求是否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新清史”学术体系的本质何在？

笔者经过长期以来对该学派著述的研读体会，倾向于将整个“新清

史”学术体系中最本质化的表述概述为“一个论述中心”，即国体论，这指的是其诸多研究结论主要系围绕清朝国家政权的基本结构特征而展开；“两个参照系”分别是指此前的明朝和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多数“新清史”学者将以汉人建立的明朝判定为典型中华帝国王朝的代表，与全身上下凸显“内亚性”的清帝国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清帝国与1911年以后的现代中国在政权的“合法性”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少有共识。至于在20世纪初期的传统帝制趋于解体的时间节点上，“新清史”体系逻辑化的学术预设则是完全接受西方学界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解释模式，故其给原清朝统治下的广袤地区拟定的政治出路就是“五族共和收拾起，大家齐做自由人”，相当于各大地理版块上的人群自主建国。

为了便于读者具体直观地理解这一点，笔者使用“公寓—房间”的譬喻来比拟“新清史”学术体系中对帝国转型前后历史发展道路的总体瞭望。这就好比说，原先在东亚存在一间大型公寓，里面容纳若干单独的房间。整所公寓曾经长期存在一位主人（其对应清朝君主），每个房间也有各自的住户（分别对应满、汉、蒙古、藏、回部等不同人群），平时这些住户都一致服从上述公寓主人的领导，然而公寓内各个房间彼此的联系却未必紧密，尤其是汉人所在的房间与其他几大人群的房间更是殊少往来。现在到了1911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公寓原来的老主人已寿终正寝，不复存活，那么按照“新清史”学派的典型观点，随后“合理”的演化结果则应是这些房间内的人们纷纷自立门户，各建其国，而不是再创出一个新主人来重新把大家再次聚合在一个所谓的统一国家之下。因此，“新清史”最终拷问的恰恰是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究竟该如何转型的现实敏感政治问题，而其早已准备好的“从一到多”的预设答案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性，实际上就中国作为一个从帝制时代转型而来的新生多民族国家对于边疆地区主权诉求的合法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如果要选一个最能凸显“新清史”研究特点的关键词，很多人可能会倾向于选取“反汉化”“满洲性”“内亚性”等专门术语。然而，就本质看，“同君联合体”（借自相关日本学者）才最能反映“新清史”研究的根本特点。与之相对，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将清朝视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

个王朝，并且将其定性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实际上是折射出一种单一制国家的定位，由此规范了清朝君主的个人形象——他是单一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定位同时还强调在君主领导下的官僚机器在国家中的维系和联结作用。

然而，在“新清史”学派的历史书写中，清帝国则被描述为一个“星座型政体”（欧立德语），其背后折射出一种相当于复合制国家的定位。两者的区别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就国体而言，单一制国家注重国家上下层之间垂直的、纵向的联系，强调的是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而“同君联合体”型国家则在“共同君主”的表面形式下更加依赖于国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横向的联盟关系，因此，国内的各大组成部分始终保持着较多的政治自主性，甚至可以说是国中有国，如柯娇燕在相关论文中就将清朝统治下的喀尔喀诸汗所属的领地区域界定为复数意义上的汗国（khanates）。^①

第二，在地理空间方面，在有关单一制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汉地、东北、蒙古、藏区、回部都是清帝国的直属领土，而“新清史”学派将清朝统治的广大地域定义为“受保护地”。如柯娇燕于2008年在法国《年鉴》上发表文章称，清朝实际上的直属领土只有处在关外的东北亚，其余地域都是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受保护地”，由此对清朝统治的地理空间做了类似于西方殖民帝国那样的“直属领土 VS 海外殖民地”的空间性二元切分。

第三，至于在主权方面，中国学者主张以上各大地理版块无论内地还是边疆都是清朝的直属领土，因而清朝对它们的管辖均可以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范畴。但在“新清史”学者看来，清朝对“受保护地”的统治并非一种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管辖，而只是类似于“宗主权”名义上的间接治理，尤其是在西藏和回部（天山南路），其内部近乎一种自主管理状态。在帝国解体之后，这些地区自然应该脱离宗主权，走向彻底的“独立”。“新清史”的学人由“同君联合体”概念引发出的论述重点，便是过度放大君主权力的高度象征性与符号化，突出表现在清朝帝王的“共

^① P. K. Crossley, “Making Mongols”, in. P. K. Crossley, H. F. Siu etc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 75.

主”性、多语种的“合璧”与复数化的首都等方面。

笔者认为，“新清史”的如上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升级版。所谓“新瓶”指的就是充斥于其论说中的西方时髦话语体系，而“旧酒”则是此前早已有之的观点，如“同君联合体”及“共时性君权”理念中的将君主视为联系整个帝国的唯一纽带的认知恰恰就落入了早已被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彻底推翻的“朕即国家”论的窠臼。而他们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等地的管辖有意定性为“间接统治”的表述，事实上也不过是接受了《西姆拉条约》前后英印殖民政府动用外交资源试图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矮化为“宗主权”的殖民时代的唾余残渣而已。至于在学理实践中，“同君联合体”概念在学术实践中表现出与“中国意识”的相克，即“中国”只是清帝国治理下的一个空间区域，与其并列的至少还有满、蒙古、回、藏四大地域。由此该学派通过把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的空间范围极度压缩，进而否认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这与我国学界的认知存在着完全无法调和的根本性差异。

“汉化论”究竟起源于何方？

目前国内学界围绕“新清史”的讨论中，有关“汉化”的争论是最引人热议的话题。然而，笔者相信在整个“新清史”的论述体系中，“反汉化论”只是用来开启连锁效应的第一张骨牌，而其试图推翻的最后一张骨牌，则是对1911年以后中国对边疆地区的主权诉求提出挑战。故“反汉化论”并不像“同君联合体”那样是该学派的核心概念，“新清史”对其的着力强调主要是为了论证“中国民族主义”的某种“政治不正确性”，即将“汉化”建构为中国学者基于偏狭的“民族主义”而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沙文主义色彩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叙事，故无法有效地用作历史

研究的分析工具。^①

然而，事实上最早系统地提出汉化论的绝非中国学者，而是17世纪以来的来华传教士和19—20世纪之交俄国的民族学家们。早在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李明在给本国红衣主教的书信中，明确表示鞑靼人（满人）几乎都因汉化而战斗力不强。18世纪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在寄回法国的书信中说道：满洲人能改变汉人的仅仅只是衣着方式和剃发。他还特别注意到满人只讲汉语的现象。虽然这一观点不免偏颇，但至少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北京地区当时的情况。巴多明认为，这符合了中国历史上常见的规律，即外来的征服者最终会被被征服者（汉人）所同化。^② 降至19世纪40年代，同样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古伯察基本上重复了巴多明的观点，而且还把以汉语普及为中心的汉化现象所覆盖的地域延伸到了关外的东北。^③ 虽然传教士的陈述带有个人观察的性质，但其要表达的内容在本质上与后来学界关于“汉化”的论述并无分歧。再以受过近代西方学术熏陶的俄国民族学家为例。最早提出民族要素的东方学家巴拉第司铎通过1870—1871年在东北地区的实地旅行调查，指出了满洲地区汉化不可逆转的事实，并确认满洲的民族性因为汉人的影响而陷入濒危状态。^④ 更晚到了19、20世纪之交，基本上接受了巴拉第民族概念的史禄国（他后来成为费孝通的导师）在黑龙江瑷珲满族聚居地进行了田野调查，得出结论说：北京和辽东的满人基本汉化。只有在以瑷珲为中心的满洲北部，汉人对满人的文化影响还不那么强烈。而在吉林等中部地区，则是满人的部分汉化。^⑤

综上，如果“新清史”学者真的要对“汉化”概念进行批驳或者解构

① 对此有关的概括参见王成勉：《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嘉义：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第61—62页。

② [法] 杜赫德编，耿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第四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③ [法] 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22—124页。

④ 井上絭一：《パラディウスのウスリ—南踏査记——翻译と解説》，畑中幸子等主编《东北アジアの歴史と社会》，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131页。

⑤ [俄] 史禄国著，高丙中译：《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13页。

的话，那么其兴师问罪的目标首先应该指向上述那些欧洲传教士和民族学家等群体，而不是对之熟视无睹，不置一词，反而屈从于某种现实西方话语下流行的“政治正确性”，牵强地将“汉化”与中国近代以来在数次革命高潮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应正名为抵抗外侮，维护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思潮生硬地拉扯到一起，故这种带有明显政治取向的做法正是“新清史”学术体系自身非学术化的一个铁证。

内亚各大族群是否看重“满汉之别”？

逻辑上的“反汉化论”与主题上极力彰显的“满洲性”（或“内亚性”），导致“新清史”学派高度推崇清朝对内亚的成功统治得益于其秉持的非汉因素以及随之导致的各大内亚族群在政治上更加认同一个像满洲统治者这样的非汉人作为内亚各族的“共同君主”。不过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一个充满先入为主色彩的立论前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发问：由首崇满洲性（内亚性）所衍生出来的“满汉之别”或“旗民之分”，成为当时清代内亚各大族群的显性化观察目标了吗？就此问题，理应区分地域予以考察。

首先来看被视作清朝“龙兴之地”的关外东北。目前德国学者业已整理出版了由当初史禄国在黑龙江流域一带的通古斯人中记录的语言词汇卡片，即《通古斯方言词源学——民族学辞典》。书中收录了两个词语：bogdo（博格多）和 manju（满洲），它们原是通古斯人用以专指明末清初狭义上的满族人，但到了史禄国开展田野调查的19、20世纪之交，这两个词语已被用于指代汉人。^①这说明东北地区的民族界限在清朝后期与前中期相比业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到清中期以后，在作为黑龙江流域最主

^① G. Doerfer, *Etymologisch – Ethnologisches Wörterbuch tungusischer Dialekte*,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4, p. 132, 535.

要的世居居民通古斯人的眼中，由于满汉民族间文化界限的模糊乃至消失，故再继续区分满汉实质上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原来只是用以称呼满人的名称后来渐渐又被拿来指代汉人。

下面再看蒙古。顺治年间，蒙古人曾将满洲人看作同类，称满洲为“红纓蒙古”，视满洲与蒙古之间存在亲缘关联。但当清朝入关后，喀尔喀王公在致顺治帝的书信当中，还继续沿用“红纓蒙古”称满洲人的时候，却遭到了顺治帝的断然驳斥。^① 17世纪末，在蒙古文的哲布尊丹巴一世的传记中曾提及该活佛称康熙为“佛法流行的南方黑契丹可汗”，将清朝皇帝视为黑契丹皇帝，而在蒙古语中，契丹一词本来只是指汉地或汉族，由此可见那时的漠北蒙古人眼中的契丹同时包括了满族与汉族。^② 18世纪中后期，在青海蒙古族学者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中，作者径直将顺治皇帝称作“红色汉人大金汗的后裔”，这等于将原先女真人兴起的东北之地也划入汉地之中。^③ 质言之，汉地不光包括中原，还包括了东北（满洲）。

至于回部（新疆）的情况则自有其独特之处。在哈密等地新修的城池中，有不少是满城汉城合一的，当地人往往将这些城池统称为“契丹人（汉人）的城池”。降至18世纪中期，清朝平定准噶尔汗国以后，逐渐与控制哈萨克草原的阿布赉苏丹建立了宗藩关系。在接受后者使臣的觐见中，乾隆帝向其宣称契丹人和哈萨克人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应该互相亲近，以之劝说哈萨克人归顺清朝的统治。^④ 显然，无论是说汉语还是操满语，乾隆帝都不大可能直接在交谈中使用“契丹人”这个词指代其出自满洲人，但对前往觐见的哈萨克使臣来说，他们显然不大注意区分“契丹人”与“满洲人”之间的民族差异，故才会在回国的报告中直接改用了“契丹人”这个本来只是指代汉人的名称来表示乾隆帝原话中极有可能出现的“满洲人”一名。与之颇为类似的是，清代游牧于天山至七河流域的

①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杨绍猷：《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③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等译：《如意宝树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7页。

④ [哈]克拉拉·哈非佐娃著，杨恕等译：《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2—213页。

吉尔吉斯人则在民间史诗中将准噶尔人与满洲人合在一起并称为“契丹—卡尔梅克人（蒙古人）”，将其视为吉尔吉斯人的对立方。而在史诗的描述中，“契丹—卡尔梅克人”的衣饰特点完全相同。^①这实际上不仅将满洲人视为“契丹人”，甚至对满、汉、蒙古三大族群之间的差异都没有做进一步的区分。

最后再看藏区的情况。藏语中直接使用“满洲”的地方很少，常见于藏文文献的 rgya-nag（黑汉）一词兼指地理和人群意义上的汉地（汉族）和东北（满族）。故在最近披露的西藏地方官员康济甯的书信中，出现了明确将清朝称为“汉人国”的情况。^②按在当时藏族的地理观念中，整个世界主要是由从雪山（喜马拉雅山）往东一直延伸到大海的大地组成，其中相对偏北的草原地区是霍尔（蒙古），本民族所在的雪域高原是藏区，后者再往东即为汉地。由此从藏人的地理观念上看，包括关外东北在内的广袤地域都属于汉地的范围之内。

通过对以上四大地域的考察，笔者认为，待到清朝稳定统治内亚地区的18世纪以后，多数情况下内亚各大族群并不注重区分“满汉之别”，更不会去进一步留意所谓的“旗民之分”，因此被“新清史”学者们包装推出，大书特书的满洲统治者凭借与内亚各族共享的文化—血统上的“内亚性”，从而成功地怀柔笼络住他们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仅是缺乏有力证据支撑的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

对“新清史”构建的殖民征服叙事的批驳

在本序言的最后，笔者针对当下“新清史”强调的清朝也是殖民帝国

① A. T. Hatto, “Mongols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kirghiz epic”, in W. Heissig etc eds. *Ge-danke und Wirkung. Festschrift zum 90. Geburtstag von Nikolaus Popp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9, pp. 139—145.

② 齐光：《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第169页。

的说法，从理论和史实的角度均持异议。以下试做初步的提示：

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将地理大发现以后兴起的殖民帝国初步分为海基型和陆基型两类，前者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为代表，后者以沙皇俄国为代表。而殖民帝国的一大突出特征是人口的流动通常均具有单向性，即人口从殖民母国不断流向新征服的殖民地。这正如英国的本土人口大量流入北美及大洋洲等海外各地，直至完全改变了那些地区的人口比例，造成土著的世居居民无论是在人口数量上还是生活条件上均沦为边缘化的弱势人群。同样沙俄自16世纪开始向西伯利亚进行的大举扩张过程，也直接导致大量说俄语的人群流入西伯利亚地区，及至19世纪，西伯利亚的许多土著人群在数量上已经陷入濒危境地。与之相反，在殖民时代从来没有发生殖民地的世居居民大举外流到殖民“母国”并在那里定居乐业的情形。现在我们通常熟悉的欧洲各发达国家出现数量可观的外来移民的情况其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日益瓦解，同时这些西方国家因自然出生率持续下降而严重匮乏基本劳动力才合力导致了其政府愿意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外来移民这种全新的社会现象。

至于清朝的基本现实则与欧洲的殖民列强截然不同。简言之，当时中国的人口流动特征是一种有别于殖民背景下的双向流动。以东北和关内为例，随着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的渐趋松弛，大量汉人逐渐有机会移居东北谋生繁衍，终至彻底改变了此地的人口比例。根据彼时一直觊觎满洲的俄国人在1842年对东北当地的人口估算，平均每3.5万个满洲人就需要面对足足160万汉人（原文是中国人），比例近乎1:50。^①按照“新清史”的主流叙事，汉人在清朝并不是统治民族，内地则属于“被殖民”的对象，但是现在被统治民族反而成功地“殖民”了本为“龙兴之地”的东北，不知这对他们而论，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如果说汉人在关外等地的移入具有“殖民性”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在清朝入关后，大量满洲士兵及其眷属蜂拥涌入内地，在以北京为代表的若干内地驻防城中确实出现了小范围改变当地人口比重的新现象。故有清一代既有过汉人大批移往关外或口外的内亚边疆地

① [俄]伊·费·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91页。

区，也存在像满族这样的内亚民族大举内迁的情况，所以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殖民背景下的人口双向流动，而无论是汉人的外迁还是满人的入关，都不具有殖民的基本特性，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即同时存在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和汉人徙往边疆的双向人口流动情况。相反如果像“新清史”那样，一味教条主义地照搬挪用殖民征服叙事来解释清代的历史特性，无疑会遇到上述从学理上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

当然“新清史”的学者还会以新疆为例来对清帝国的“殖民性”津津乐道。在这些学者看来，“新疆”一词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最好写照，因为它不正好就是“新（征服）的边疆”（new frontiers）的含义吗？其实这种自以为是的理解纯属望文生义，因为“新疆”一词作为地域专名早在雍正时期就已见于清朝官方记载，其指代的是当时朝廷正大力推进改土归流运动的贵州境内多地，朝廷之所以发明“新疆”一名来指代这些地区，是因为它们此前主要由本地土司世袭统治，中央朝廷只能对之间接控制，而经过改土归流以后，则由朝廷派出随时可以更换的流官来直接管理，相当于在行政事务上逐渐与内地的制度接轨，故“新疆”的真实含义意味着原来只是中央间接统治的边疆区域现在成为朝廷的直辖之地。^① 如果按照“新清史”的以上定义，那么同样身为“新疆”的贵州多地岂非在雍正时期才第一次成为中国的领土？故其说的误导性可见一斑。

更为重要的是，非汉文史料显示出，在中亚人的地理观念中，天山南北两路长期属于“契丹”或“秦”（皆为中国的代名词）的一部分，因此今新疆地区和中原内地等皆为空间共同体“契丹—秦”（中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在18世纪中期之前，这个空间共同体尚未转变为国家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但这并不妨碍中亚的人士同样将控制天山北路的准噶尔汗国视为中国，例如在18世纪前期驰骋西亚及中亚的被称为“亚洲大陆最后的征服者”的伊朗君主纳迪尔沙，即将准噶尔汗国视为秦（中国），且当时的清朝和准噶尔部都常常被看作秦—契丹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考察，双方的冲突只是尚未统一的同一国家里的内战，而绝非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扩张与征服。关于非汉文史料所揭示的这类问题，本书后面的章节将要详细展开讨论。

^① 肖之兴：《清代的几个新疆》，《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第一章 北美“新清史”研究兴起的学科背景及其学风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标榜使用非汉文史料作为研究基础而著称，同时还十分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乃至内亚因素以解构传统“汉化”命题的所谓“新清史”研究流派渐渐在北美中国学界的帝制晚期历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并对于美、加之外的学术共同体也开始发挥出持续而有效的影 响。以中国大陆历史学界为例，正如最近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新清史”在其流行之初并未对国内清史界产生显著影响，因当时的中国学者仍多致力于对孔飞力（Ph A. Kuhn）、魏斐德（Fr Jr. Wakeman）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著述的译介与回应；但是随着最近十多年学术界所悄然发生的新旧更替，“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更多地受到年轻一代学人的重视乃至热捧。^①的确，稍稍浏览最近国内主流文化媒体如《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的访谈文字即可证明上述观察信实不虚。可以说目前大陆学人对于“新清史”的评价主要源自两个在学科属性上迥异但又兼有联系的群体——清史（含满族史）学者群和专治国际汉学或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群。这两大群体固然对于其所评议的对象在认知上不尽相同，但另

^① 定宜庄、胡鸿保：《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清史论丛（2012 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年，第 12 页。